

金砖国家研究专题

金砖国家合作：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南非] 布萨尼·恩格卡维尼 邦加尼·玛伊梅勒

内容提要：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使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在于它主要基于西方普世性概念，将整个世界视为单一的同质实体，否认不同的价值和治理体系的存在。世界遭遇西方普世化，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因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西方提出的要求而无法获得发展资金。通过单一维度实现世界普世化的做法是殖民的产物，并且仍然作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破坏了多元化，否定共同繁荣的前景。金砖国家进入全球治理体系，是希望建立一个基于所有国家现实的多元世界。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促进和保护多边主义，成为建设多元世界的基石。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下，金砖国家致力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对话，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金砖机制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扩展使得它们能够选择愿意与之合作的机构，减少对西方主导的、僵化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

关键词：多元性 普世性 殖民主义 全球治理 发展
金砖国家

作者简介：布萨尼·恩格卡维尼 (Busani Ngcaweni)，南非金山大学维茨管理学院和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邦加尼·玛伊梅勒 (Bongani Mayimele)，南非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关系部主任。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2) 05 - 0074 - 16

^{*} 本文译者于蕾，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翻译。

1978年，塔博·姆贝基作为现任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指出：“现代政治学赞成这样一个事实，即每种社会制度都有确定的历史渊源。如果‘万事皆有因’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说未来形成于现在，现在孕育着未来。因此，所有社会都带有自身历史的烙印。而历史能否产生重大影响，则取决于每个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外因素。”^①

当今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其本身是真实还是扭曲，都制造了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兴的学派试图重新设计这个世界惯用的观察自身的棱镜，特别是要挑战克雷加祖所说的“一个世界、一个现实、一个宇宙的谬论”^②，以及恩德洛夫—加特谢尼所说的反对多元性的“错误而坚韧的概念——没有他者的世界”^③。埃斯科瓦尔将多元性这一观点描述为看待现实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一个世界假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只存在单一事实，前者则认为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或主观表征。^④

上面提到的“一个现实”的产生，既是权力的创造，也是权力的产物。既然万事皆有因，那么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根源则带有普世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印记与思想。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源自征服、西方霸权、利益博弈和影响力之争的历史，如果听之任之，全球治理体系将继续通过议程设置、控制知识生产与传播来定义大多数全球现实，简言之，即认识论霸权。

虽然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所谓的“共同利益”之上，但深受其创建者思想的影响并反映创建者的利益。张振燮认为，全球治理体系依然是新自由主义范式在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发生变化的结果，受到国家、国际组织、科学界等众多行为体的影响和定义。^⑤

在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展开的这场影响力之战中，历史一再重

^① T. Mbeki, “The Historical Injustice”, in *Sechaba*, March 1979.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africa/anc/1978/historical-injustice.htm>. [2022-05-20]

^② A. Querejazu, “Encountering the Pluriverse: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in Other Worlds”,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 59, No. 2, 2016, p. 7.

^③ S. N. J. Ndlovu - Gatsheni, “A World Without Others? Specter of Difference and Toxic Identitarian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Diversity Studies*, June 2018.

^④ A. Escobar, “Transiciones: A Spac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ransitions to the Pluriverse”, in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Crows Nest*, Vol. 13, Issue 1, May 2015, pp. 13-23.

^⑤ J. Jang, J. Mcsparren, and Y. Rashchupkina, “Global Governance: Present and Future”,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2016.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 [2022-05-20]

写，从而推进某些议程并获得主导地位。科学界和游说团体代表各种各样的利益或资助者的利益，持续影响全球治理，使普世主义长存而无视其他现实的存在。这助长了新殖民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往往代表所谓的强国的利益，在这一格局中，金砖国家机制的形成是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这一机制接受多样性，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多元性为那些无法阐释或分享自己的现实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阐释和编织自身现实的空间。在狮子学会讲故事之前，猎人永远是赢家。这里的猎人是殖民者，他们抹去了“荒地”的历史，讲故事称颂自己，而非赞颂狮子（即原住民）。

一 多元性是什么？

《多元性：关于反发展的词典》一书由科塔里等人在 2019 年编辑出版，其中包含 100 多篇关于多元性的文章。学者们对该书的评论指出，多元性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和人类的意义，为建立反认知共同体作出宝贵贡献。^①

这表明多元性受到高度重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利用多元性来驱散“一个世界”的谬论。格罗斯福格尔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出了‘多元性’这一至关重要的概念，是真正的民主和非殖民化的方案，能够替代西方提出的‘普世性’概念，后者带有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色彩。”^② 佩里支持该观点，她认为“多元性是从非殖民化运动思想中诞生的概念，它为当代北方国家提出的普世性设想提供了一种反叙事”，并展示了“一个基于‘世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共享计划”。^③ 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将多元性描述为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创造认知多样性。^④ 米格诺罗指出：“多元性不是文化相对主

^① A. Khothari, A. Sallae, A. Escobar, F. Demaria, and A. Acosta (eds.), *Pluriverse: A Post Development Dictionary*, Tulika Books, 2019.

^② R. Grosfoguel, “Towards a Decolonial Transmodern Pluriversalism”, in *TRANSMODERNITY: Journal of Peripheral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Luso-Hispanic World*, Vol. 1, No. 3, 2016.

^③ M. Perry, “Pluriversal Literacies: Affect and Relationality in Vulnerable Times”, in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6, pp. 293-309.

^④ Vasconcelos and Martin, “Plurality, Plurilogicality and Plurivers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 review for the Creativity and Emergent Educational - futures Network (CEE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Undated. <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 [2022-05-20]

义（由一个个独立单元构成的世界），而是几种不同的世界观在当前的权力差异格局中的交织。”^①

多元性是“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一个世界假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只存在单一事实，前者则认为存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观点或主观表征”。^② 恩德洛夫—加特谢尼认为“一个世界”的观念对人类而言存在严重缺陷，并进一步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的范式，该范式建立在在对单一性的坚定信念之上，即一个上帝、一种国家、一种知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一种身份、一种性取向、一种宗教、一种认知方式、一种经济制度、一种政治制度、一种道德秩序、一夫一妻，也建立在笃信有边界的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僵化观念之上。^③ 这无疑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④

埃斯科瓦尔认为，关于世界的普世性观点及世界的治理与“多元性提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承认存在多种现实，但并不以更真实的描述为由‘纠正’单一现实的观点”。^⑤ 因此，多元性并未质疑那些有助于我们管理日常事务的共同标准和受到广泛研究的现象，例如距离、重量、温度等的计量标准。恰恰相反，根据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的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性拒绝接受“普世主义思想的普遍化”^⑥。作为一个完整的真理，在这个真理之下不存在其他世界。多元性仅仅希望提出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其他科学和知识，正如布莱泽、德拉卡德纳、埃斯科瓦尔等人断言，多元性是一种工具，可以成为“一个世界”谬论的替代方案，并与想要打破“一个世界”叙事的其他世界形成共鸣，也“意味着从‘全球化’和‘全球研究’等一个世界的概念向以多元性为中心的概念的转变，这是一种由多个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但又

① Walter D. Mignolo, “Foreword. On Pluriversity and Multipolarity”, in Bernd Reiter (ed.), *Constructing the Pluriverse: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ix – xvi.

② A. Escobar, “Transiciones: A Spac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ransitions to the Pluriverse”, in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Crows Nest*, Vol. 13, Issue 1, May 2015, pp. 13 – 23.

③ S. N. J. Ndlovu – Gatsheni, “A World Without Others? Specter of Difference and Toxic Identitarian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Diversity Studies*, June 2018.

④ A. Querejazu, “Encountering the Pluriverse: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in Other Worlds”,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 59, No. 2, 2016, p. 7.

⑤ A. Escobar, “Transiciones: A Spac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ransitions to the Pluriverse”, in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Crows Nest*, Vol. 13, Issue 1, May 2015, pp. 13 – 23.

⑥ Vasconcelos and Martin, “Plurality, Plurilogicality and Plurivers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 review for the Creativity and Emergent Educational – futures Network (CEE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Undated. <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 [2022 – 05 – 20]

截然不同的世界形成的多样性”，而非简单的二元论。^①

因此，多元主义思想的传播构成了颠覆普世主义的力量。普世主义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之上，通过认识论暴力，抹去和篡改那些被认为是“荒地”的国家的历史。这一点得到了克雷加祖的支持，他指出：“普世性的概念异常强大，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强行当作现实，其中一些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加暴力。这一概念已经变得如此强烈和自然，以至于似乎无可争辩。”^② 这是通过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各种工具实现的，目的是维持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文明的依赖，以及西方文明对其他地区的统治，进而延续它自创的优劣概念。但通过寻求其他真理和接纳来自全世界的本体论追求多元性是有争议的。米格诺罗总结得好：“多元性作为一个普遍方案，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改变对世界的信仰和理解（知识论），这将改变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实践。”^③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单一的世界观被用于构建世界及其制度，这些制度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并在西方现代性的范围内规定了我们的发展规则，而忽视了人类及其信仰体系和自然环境的多样性。

二 普世性及其局限性

普世性是认识论暴力的产物，也是西方统治和发展的工具与产物。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诉求蕴含着桑托斯所说的“深渊思想”，认为世界是二元的，即普世性位于深渊线的一侧，其他所有知识体系位于深渊线的另一侧，由于殖民时期蓄意造成的认知盲目性，其他知识体系被认为晦涩难懂、微不足道，缺乏科学性。^④ 万事皆有因。普世性观念的出发点在于，它本身具有不可改变、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因此在知识学、治理和人类发展方面是毋庸置疑

^① M. Perry, “Pluriversal Literacies: Affect and Relationality in Vulnerable Times”, in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6, pp. 293 – 309.

^② A. Querejazu, “Encountering the Pluriverse: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in Other Worlds”,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 59, No. 2, 2016, p. 7.

^③ Walter D. Mignolo, “Foreword. On Pluriversality and Multipolarity”, in Bernd Reiter (ed.), *Constructing the Pluriverse: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ix – xvi.

^④ B. Santos, “Beyond Abyssal Thinking: From Global Lines to Ecologies of Knowledges”, in *Revista Crítica de Ciências Sociais*, Vol. 80, 2007. <http://www.eurozine.com>. [2022 – 05 – 20]; Vasconcelos and Martin, “Plurality, Plurilogicality and Plurivers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 review for the Creativity and Emergent Educational – futures Network (CEE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Undated. <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 [2022 – 05 – 28]

疑的，而对其可能被质疑的挑战则是非理性的。同样，全球治理体系也并非凭空而来，它源自当时西方统治力量的思想。扎伊科娃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统治阶级和统治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指出，“社会是由统治阶级的思想塑造的，这些思想表达并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思想和价值观不能独立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而存在。统治阶级的思想经常被描述成普世真理，并且符合人民的利益。”^①

佩里阐明了扫盲对于塑造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扫盲作为教育的支柱和社会变革的工具，与可持续性、公平、发展的政策和实践密不可分。”^② 查塞在其会议论文中指出，“当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时，欧洲殖民主义仍然十分活跃”^③，并引用了李的观点：“在联合国机构建设过程中，欧美国家的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被前欧洲国家殖民地的代表所接受”^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国是按照前欧洲殖民者的思想建设的。当时欧洲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延续殖民统治的认知暴力得以推广，并最终成为联合国的主导思想。

这个过程本身源于深刻的认知暴力。马克迪西指出：“在1790年至1830年之间，超过1.5亿人的历史被英国人通过浪漫主义在‘荒地’中抹杀。在此期间，英国文学和艺术创作在浪漫主义中呈现出极大繁荣，宣布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充满社会和个人创伤与可能性的新世界。”^⑤

活跃的殖民统治和浪漫主义的核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该观点意味着欧洲科学和知识对其他科学和知识的胜利，以及这样一个谬论：“欧洲以外的世界都是‘荒地’，不能为人类作出任何贡献，而欧洲代表世界的未来，拥有最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特别是自诩为普世的多元主义民主。”^⑥

① A. Zaykova, “‘Ruling Class and Ruling Ideas’ by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 A Summary”, 2014. <https://midnightmediamusings.wordpress.com/2014/06/19/>. [2022-05-28]

② M. Perry, “Pluriversal Literacies: Affect and Relationality in Vulnerable Times”, in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20, pp. 293-309.

③ D. Chassé,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UN System Conference*, Universität Luzern, 2013.

④ C. J. Lee, *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 The Bandung Moment and Its Political Afterlives*,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 S. Makdisi, *Romantic Imperialism: Universal Empire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8.

⑥ S. N. J. Ndlovu – Gatsheni, “A World Without Others? Specter of Difference and Toxic Identitarian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Diversity Studies*, June 2018.

恩德洛夫—加特谢尼指出：“欧洲理念的核心是将特殊性普遍化，这个过程被称为欧洲化。”^① 欧洲化和现代化受到帝国意志的驱动，强行向外推销欧洲或西方的世界观。米格诺罗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西方普世性的普遍化是其帝国计划的一部分。”^② 非洲的大学使用西方认识论范式来构建知识模型，将命题知识视为普遍的、客观的、科学的、抽象的、中性的、非历史的、无实体的、无个性的和跨文化的，简而言之，普世性是世界其他地区必须适应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世界欧洲化。可以肯定地说，1492年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是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巴斯孔塞洛斯和马丁哀叹现代性的人为优越性，称现代性是“一个在根源上带有西方标榜的普世性的谎言”^③。毫无疑问，欧洲中心主义对欧洲殖民前哨如何塑造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查塞指出，联合国成立20年后，也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帝国主义治理结构才让位于随着主权国家崛起而产生的新的主导结构。这说明西方的思想会影响全球治理。当时，只有17个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全球“国家大家庭”的概念似乎有了新的合理性。^④ 更糟糕的是，1945年在英国统治下、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加入了联合国。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在对黑人的压迫和征服的基础上。

可以肯定地说，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之所以能够加入联合国，是因为它相信白人的普世性和欧洲的优越性。这一观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统治阶级的论述相结合，有助于加强这样一种论点，即全球治理体系带有殖民历史的烙印，殖民者的思想通过普世性理念的长期存在主导联合国系统。换句话说，当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时候，全球治理体系的设计已经被殖民统治阶级的思想所强化。因此，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一个并非由它们设计的系统的参与者，这是一个围绕普世性而非多元性构建的系统。杜根等人

^① S. N. J. Ndlovu – Gatsheni, “A World Without Others? Specter of Difference and Toxic Identitarian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Diversity Studies*, June 2018.

^② Walter D. Mignolo, “Foreword. On Pluriversality and Multipolarity”, in Bernd Reiter (ed.), *Constructing the Pluriverse: The 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ix – xvi.

^③ Vasconcelos and Martin, “Plurality, Plurilogicality and Plurivers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a review for the Creativity and Emergent Educational – futures Network (CEE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xeter, Undated. <https://socialsciences.exeter.ac.uk/media/universityofexeter/>. [2022 – 05 – 20]

^④ D. Chassé,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UN System Conference*, Universität Luzern, 2013.

认为，“当前国际环境的特征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日益加剧，试图改变跨区域一体化倡议，消除对国际安全秩序的新威胁。”^①

当前由赞助研究、知识商业化、国际援助机构和游说团体控制的认识论机制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些机构继续推行带有认知暴力色彩的新殖民主义议程，利用“一个世界”的“普世”知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灌输政策立场，拒绝和限制任何与自己相左的声音，或者通过获得背书的“通用”科学方法，使得一套知识体系具有科学性和普世性，而视其他知识体系为非科学的知识系统，或仅仅是本土知识系统，尽管所有科学从源头上讲都是本土的。克雷加祖注意到“国际关系不仅通过认识论的学科化排斥差异性，而且拒绝其他本体论，特别是那些属于原住民的本体论，将它们归入神话、传说和信仰的范畴”^②。

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克雷加祖展示了这种权力游戏，并指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本应通过汇集世界各地的不同观点产生关于世界的知识，但可悲的是这门学科被西方控制，不仅忽视来自世界各地的理论贡献，而且加以反对^③，导致只有一套知识体系主导国际事务。正如克雷加祖所说，“这种情况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将对我们应对现实的方式以及所做的政治安排产生巨大影响，并最终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④知识、权力和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⑤根据雅各布斯和阿索坎的观点，“知识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发展，或作为生产资源，或作为对教育、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不可或缺的投入，或作为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或作为文明和文化价值观的根基，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谐，这是发展的重要基础。”^⑥

同样，伯纳德总结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殖民主义都深刻塑造了当代世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平等、种族等级制度、国家形式、国际贸易模式和资金流动方式，以及国际组织的结构都受到殖民活动和殖民遗产

^① N. Duggan, B. Hooijmaaijers, M. Rewizorski, and M. Arapova, “Symposium: ‘The BRICS, Global Governance, and Challenge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 Post-West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1925121211052211>. [2022-06-10]

^{②③④} A. Querejazu, “Encountering the Pluriverse: Looking for Alternatives in Other Worlds”, in *Revista Brasileira d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Vol. 59, No. 2, 2016, p. 7.

^⑤ H. Weiler, “Whose Knowledge Matters?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Undated. https://web.stanford.edu/~weiler/Texts09/Weiler_Molt_09.pdf. [2022-06-10]

^⑥ G. Jacobs and N. Asokan, “Vision 2020: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Presentation to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Govt. of India, August 8, 2000. https://www.icpd.org/development_strategies. [2022-06-10]

的强烈影响。”^① 研究如何灌输政策立场没有错。但是，当只有一套知识体系享有拥有听众的特权，而另一套知识体系被贬低，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恩格卡维尼对当前的形势评论道：“我们必须将多元性作为一种反对霸权的理念来追求，这样才能从人类经验的整体中找到解决方案。这包括废除殖民主义及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知识体系的扼杀，不让殖民主义在普世性的幌子下持续存在。”^② 尽管经历了改革，但全球治理的架构仍然带有历史的烙印，这是一部在普世性旗帜掩盖下的宗派利益、霸权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普世性认为世界上没有他者的存在，从而使新殖民主义永存。金砖国家正处于改变现状的位置，并已成为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三 金砖国家合作：走向多元世界的基石

在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之时，欧洲殖民主义仍然活跃，大多数南方国家都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包括今天的金砖国家成员南非和印度等国家。巴西在19世纪初期获得独立，而俄罗斯从未遭受过殖民统治。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金砖国家成员在1945年并未全部作为独立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前面引用的查塞的话提到，联合国在成立时是由欧美国家主导的，这种主导地位在当时欧洲殖民地的代表中引起了广泛反响。^③ 那时，两个现任金砖国家成员印度和南非，作为殖民前哨加入了联合国。它们的表达可能受到当时宗主国的限制和深刻影响。因此，全球治理的理念并没有考虑多元性，而是基于欧美理想的世界模式，即“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

由于大多数国家努力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禁锢，以及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21世纪见证了世界向着以更加公平和多元的世界秩序为基础、以多边主义为核心的多极化格局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金砖国家成为多极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寻求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因

^① N. Bernards, “How do Colonial Legacies Shape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Warwick, British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0. <https://www.bisa.ac.uk/articles>. [2022-06-15]

^② B. Ngcaweni, “Addres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New Executive Course on Humanitarian Affairs and the Master of Sociology on Humanitarian Affairs”, offered by Soochow University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Red Cross Academy, 2020.

^③ D. Chassé,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UN System Conference*, Universität Luzern, 2013.

为大多数国家都被剥夺了在全球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一席之地。^①

宗迪论证了金砖国家在改变以普世性为核心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他写道：“金砖国家平台汇集了塑造全球话语方面已成为战略性的力量……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它们都有改革的想法，希望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体系。”^②

杜根对金砖国家的重要性持有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尽管关于金砖国家影响全球议程的能力存在争议，但它仍然是全球范围内通过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全面的多边平台”^③，并协调其成员的立场和全球更多南方国家的立场来创造一个多元世界，以确保它们处于全球治理体系的主流位置。杜根进一步声称，“金砖国家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为它连接了不同的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整合者，可以被视为南南合作的潜在推动力，”^④它捍卫了发展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以及渴望多元化的成员国的利益。

金砖国家追求多元化的第一个标志是2009年金砖国家成立之初，宣布支持全球治理改革，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它主张由二十国集团而非八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或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来协调此类改革。^⑤此举是为了确保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多元化和非殖民化。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呼声就是非殖民化的呼声，因为这个体系是由欧美国家主导建立的。

金砖国家“表达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认为发达国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方面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⑥，这明显体现了多元性的思想。为了表明金砖国家是走向多元化的新力量，宗迪继续说道，“共同繁

① A. Dutta, “Multilateral Diplomacy: Role of BRICS in Altering the Discourse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 Technology Research*, Vol. 8, Issue 10, October 2019.

② S. Zondi, “The BR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 Decolonial Perspective”, 2019. <https://journals.co.za/doi/pdf/10.10520/EJC-15b211cb40>. [2022-06-15]

③④ N. Duggan, B. Hooijmaaijers, M. Rewizorski, and M. Arapova, “Symposium: ‘The BRICS, Global Governance, and Challenge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 Post-West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1925121211052211>. [2022-06-15]

⑤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DIRCO), “BRICS and Africa: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paper for the Fifth BRICS Academic Forum met from 10 to 13 March 2013 at the Durb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www.dirco.gov.za/department/bricks_fifth_book2014.pdf. [2022-06-15]

⑥ S. Zondi, “The BR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 Decolonial Perspective”, 2019. <https://journals.co.za/doi/pdf/10.10520/EJC-15b211cb40>. [2022-06-20]

荣理念承载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建设一个比 1945 年以来二战胜利者创造的世界更加美好的世界。”^①

四 作为集体的金砖国家及其成员国

评论家们对金砖国家持怀疑态度。比如批评金砖成员国“在地理上分散，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②。然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才使得金砖国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金砖国家重视和理解多元世界的多样性。尽管存在种种质疑，但不可否认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及其各成员国在全球治理和构建多元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挑战西方的普世性，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寻找替代方案。它们通过改变全球治理体系和建立发展融资新方式作出贡献。2013 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届金砖国家学术论坛文集的前言中，宗迪在提到金砖国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和吸引力时指出：“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旧世界体系面临转型压力的时期，金砖国家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深深影响了国际关系。”^③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尘埃落定，普世性作为指导原则被置于中心地位，这意味着世界的欧洲化，欧洲和美国被描绘成拥有最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世界其他地区要想获得成功，就应当效仿欧美。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推向世界。普世性的核心是人权、民主和善治等普世价值。善治问题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主张全球只有一个可以在“普世善治”的棱镜下被共同治理的世界，因此善治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西方民主治理。

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主要冲突将是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正因为如此，西方必须摒弃对普世性的幻想。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第 14 届巴厘民主论

^① S. Zondi, “The BR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 Decolonial Perspective”, 2019. <https://journals.co.za/doi/pdf/10.10520/EJC-15b211eb40>. [2022-06-20]

^② S. Saran, “The Next Ten Years of BRICS: Will the Relationship Last?”, 2017.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7/10/brics-first-next-ten-years/>. [2022-06-20]

^③ S. Zondi, “The BR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 Decolonial Perspective”, 2019. <https://journals.co.za/doi/pdf/10.10520/EJC-15b211eb40>. [2022-06-20]

坛上对民主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民主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就像扎根在各国土壤的植物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和社会环境中汲取营养……不存在唯我独尊的民主，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① 2021年8月29日，李世默在南非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大师班上也表明了西方民主的局限性，他说：“与西方民主不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声称具有普世性。中国不会把自身制度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西方）民主是发展的灵丹妙药，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取得民族独立之前，大多数早已选择西方民主的国家至今仍然贫穷落后？”这个问题和中国通过自身治理机制取得的成功，说明了普世主义的局限性，如果世界和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欣然接受多元性，将会取得或者有可能取得成功。

普世性基于西方的世界蓝图，对多样性和几种在不同社会中已知但尚未被深入了解的相对性视而不见，特别是那些致力于非殖民化和追求多元性的社会。这种被用作霸权工具的蓄意忽视存在许多局限性，特别是与民主、人权、发展等概念相关的时候，因为发展最初的形式就是西方现代化，马顿胡将其描述为让非洲按照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紧跟欧洲的发展脚步”。^② 其他地区的西式现代化，不得不以西方的“发展”为榜样。普世性和西方标准的强制推广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多元世界中使用“普世”知识和概念常常导致许多国家发展落后，正如米格诺罗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普世性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否认所有已知的文明都建立在自身世界观的普世性之上，这些文明联合在一起形成多元世界^③。发展中国家必须满足西方对人权、民主和治理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没有适当考虑差异化和多样性。

西方普世要求的强制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资金的机会，特别是布雷顿森林机构提供的资金。那些迫切需要发展资金的国家被迫接受结构性调整方案，这是适应西方现代性必须作出的调整。本文暂不讨论结构性调整方案的惨败。然而，由于忽视多样性，这些失败促成了金砖国家机

^① Wang Yi, “Promoting True Democracy for a Better Future of Humankind”, remarks at the 14th Bali Democracy Forum, 2021.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topics_665678/kjgzbdyyq/202112. [2022-06-20]

^② J. Matunhu, “A Critique of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Theories in Afric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Vol. 3, No. 5, 2011, pp. 65-72.

^③ New Development Bank (NDB), “About Us”. <https://www.ndb.int/about-us/>. [2022-06-20]

制和新开发银行（NDB）的建立，“新开发银行的目标是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新开发银行的成立被誉为今天金砖国家的显著成就之一。因此，诸多学者将新开发银行的建立视为“金砖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和西方借贷机构吸引力日益下降的标志”^①。新开发银行的工作完善了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为实现全球增长和发展所做的努力，其工作重心是以快速、灵活、高效的方式使发展的影响最大化。^②

这种考虑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灵活性在一个多元世界中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确保所有国家公平发展。2022年金砖国家外长会晤进一步表明了对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承诺，决定“支持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促进金砖国家外联活动和‘金砖+’合作”。这一呼吁显示了金砖国家在2015年会议宣言中体现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原则，重申金砖国家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深化与其他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合作的开放性^③，由此产生了“金砖+”合作模式。金砖国家致力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对话，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这得益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的推动。^④这种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扩展使得它们能够选择愿意与之合作的机构，减少对西方机构的依赖，后者往往僵化、缺乏灵活性。金砖国家的灵活性增加了该组织的吸引力。媒体广泛报道称，伊朗和阿根廷已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伊朗外交部长声称“伊朗的加入将为双方带来收益”^⑤。

五 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金砖机制成立以来，成员国一再重申联合国在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由于联合国系统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局限性

^{①②} A. O. Latino,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Another BRICS in the Wall?”, in E. Sciso (eds.),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Democracy in the Functioning of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pringer, 2017.

^③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the Migration Authorities of the BRICS Countries”, Sochi: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ctober 8, 2015.

^④ Wang Yi, “‘BRICS Plus’ Pattern to Fully Release Vitality of BRICS Cooperation”, 2017. <https://www.mfa.gov.cn/ce/cegv/eng/wjyw/t1489003.htm>. [2022-06-20]

^⑤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2/6/28/iran-applies-to-join-brics-group-of-emerging-countries>. [2022-06-20]

(其中一些机构的成立和运行是基于西方的普世性和主导地位)，金砖国家自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呼吁改革以联合国为首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段时间以来，布雷顿森林机构持续经历合法性危机，拉蒂诺指出，鉴于这场危机，“金砖国家要求彻底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西方大国在其中占据过多席位，损害了新兴经济体的利益”^①。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联合声明指出：“我们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我们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根据杜根等人的观点，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危机之中，这从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一再失败可见一斑。受此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实际作用与其参与全球机构决策过程的机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②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年度会晤成果文件中可以找到多个例证，这些文件重申了联合国在全球多边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呼吁联合国的改革应当更加透明、平等和具有代表性。

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产物，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会晤联合声明中决定，支持建立一个基于国际法治的、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③ 该文件表明金砖国家是全球和平的倡导者。

金砖国家是公认的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该组织的这些文件十分重要。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对各种改革的呼吁常常是少数国家的特权，例如七国集团和其他在全球治理中享有垄断地位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代表各种西方既得利益者行使影响力。

本文不打算详细介绍金砖国家成员国的成就，但有两个国家的成就值得注意。

^① A. O. Latino,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Another BRICS in the Wall?”, in E. Sciso (eds.),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Democracy in the Functioning of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pringer, 2017.

^② N. Duggan, B. Hooijmaaijers, M. Rewizorski, and M. Arapova, “Symposium: ‘The BRICS, Global Governance, and Challenge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 Post-West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1925121211052211>. [2022-06-20]

^③ “Joint Statement of the BRIC Countries’ Leaders”, Yekaterinburg: Russia, June 16, 2009.

一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①。这一理念的背后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说的“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②，从金砖国家到联合国，从拉美地区到中东地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不断取得积极进展^③。

二是南非坚持奉行的外交政策，即“承认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倡合作而非竞争，提倡协作而非对抗，以非洲大陆作为外交政策的立足点，致力于南南合作，维护多边主义的中心地位；在泛非主义与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殖民的坚定立场推动下，巩固与北方国家的关系”^④。为此，南非承诺利用其金砖国家成员国的身份“确保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受益于南非金砖国家成员的身份，并确保这些地区能够在非洲联盟确定的优先领域从金砖国家受益”^⑤。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指出，“南非将根据自身的国家、地区、全球地位和议程，坚持独立掌握自身的外交政策立场，但金砖国家伙伴国共同的愿景和原则将继续确保在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上更紧密地保持一致。”^⑥ 每当受邀参加全球论坛时，南非总是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中高举非洲旗帜。

六 结语

全球治理体系带有普世性和殖民主义的印记与思想，并在其西方创立者

① A. Sooklal, “China’s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021. <http://www.dirco.gov.za/docs/2021/brics0330.htm>. [2022-06-23]

② Wang Yi,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016. <https://www.mfa.gov.cn/ce/cgjb/eng/xwdt/zgyw/t1369269.htm>. [2022-06-23]

③ Wang Yi, “Striding Forward Holding High the Banner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022.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zyjh_665391/202201. [2022-06-23]

④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e Diplomacy of Ubuntu”, White Paper on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 May 13, 2011. https://www.gov.za/sites/default/files/gcis_document/201409/foreignpolicy0.pdf. [2022-06-23]

⑤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South Africa)”. <https://www.gov.za/about-government/brics-brazil-russia-india-china-south-africa-1>. [2022-06-23]

⑥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DIRCO), “BRICS and Africa: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papers for the Fifth BRICS Academic Forum met from 10 to 13 March 2013 at the Durb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www.dirco.gov.za/departments/brics_fifth_book2014.pdf. [2022-06-23]

的利益博弈中显现出来。由于多元化、国际社会的不断变化以及人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异质性需求，需要不断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考虑到多元世界中全人类的现实，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促进和保护多边主义，成为建设多元世界的基石。鉴于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马科指出，“金砖国家不再需要成为代表五个强大的新兴经济体的机构。它需要重新定位，在一个由残忍和伪善的国家主宰的世界中，成为那些为寻求正义而疲惫不堪的国家的家园。”^①事实上，正如杜根等人的观察，“金砖国家在全球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整合者，被视为南南合作的潜在推动力。”^②正如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所说，万事皆有因，未来形成于现在，现在孕育着未来，金砖国家从当下多元化思想的影响中应运而生，必将由此出发，在未来塑造出一个接受多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学者，我们必须相互勉励，指出并支持金砖国家有意识地为解决欧洲化带来的全球弊病所做的努力。与其他多边机构一样，金砖国家也有自身的弱点，例如当成员国发生政治变革时会出现发展中断或减速。金砖国家需要在积极管理预期的同时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加快人文交流的速度和节奏。此外，应制定成熟的国家和机构能力建设计划，并使之在该组织的议程中占据突出地位。

（翻译 于 菁；责任编辑 黄 念）

^① A. Makoe, “BRICS Wise to Reposition Itself for a More Impactful Role in the Rapidly - changing World Politics”, 2022. <https://www.sabcnews.com/sabcnews>. [2022 - 06 - 23]

^② N. Duggan, B. Hooijmaijers, M. Rewizorski, and M. Arapova, “Symposium: ‘The BRICS, Global Governance, and Challenges for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in a Post - West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1925121211052211>. [2022 - 06 - 23]